

铁路放权市场还须放利于民

邓昌发 媒体人

3月10日，第六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台,铁道部被撤销。当天,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表示,铁道部虽然将被撤销,但铁路200万职工不存在安置问题,也不会裁员,铁路票价一直偏低,今后要按照市场规律,企业化经营来定票价。(3月11日《京华时报》)

毋庸置疑,对于中国铁路交通,老百姓长期以来最为在乎的始终是票价以及买票难问题,而非铁道部的命运。换言之,人们一直关注铁道部何去何从,终究不过是希望通过改革剔除铁路运输体制中的种种弊端,进而反映到低票价、高效率的惠民利民层面上。然而,眼下长期政企合一的铁道部虽然是实现分离,“末任铁道部长”盛光祖关于票价的回应,却是给人们泼了一盆冷水;当然,盛光祖事实上也只是转述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的一些话。

盛光祖原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即

铁路的平均票价很可能要上涨,毕竟市场是残酷的,企业不会做活雷锋。这一点,从近期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相继提出退股(原因是京沪高铁运营票价水平低于预期),就可以看出端倪。而在笔者看来,铁路票价以“市场规律”的理由上调尽管不存在任何逻辑问题,但仍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

原因很简单,铁路交通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并非一般的市场产品,在相当程度上它更是民生产品、公益产品,通过合理的票价体现出公平负担与政府责任,是区分铁路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的准尺。往深里说,目前铁路交通资源于民众而言(尤其是远距离运输),仍是一个需求弹性极小的产品,没有很好的替代品。如果说把一个大全民之力建起来的铁路运输网全盘推向市场,甚至最终演变为企业挣钱谋利的工具,这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换言之,上调票价必须充分考虑广大民众的承受能力,如果只



知道通过涨价去弥补企业的成本甚至利益诉求,那也就背离民众于铁路体制改革的初衷,也有损政府和国企负责任的形象。

退一步,就算最终出于公平原则确实有必要上调票价,其前提也该是公布票价成本,并且砍掉不合理的成本,然后才是公平负担。否则,在缺乏充分竞争的

铁路市场,涨价与否由企业自说自话,何以服人呢?尤其在票价构成屡成“国家秘密”的背景下,铁路运输行业工资奖金病、隐形福利病、职务消费病、腐败频出病等多种痼疾却不时引发舆论沸腾;在信息不对称的语境下,必然鲜有人相信“铁路票价一直偏低”,至于师出无名地上调票价,更易引发民意反弹。

总之,铁道部通过改革把公家的归公家、市场的归市场,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宏观上国家对铁路运输市场的调控必须具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又有牢固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进而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发挥计划与市场两个手段的长处。说白了,铁道部改来改去,都应遵循帕累托改进,其最终的结果都应是“国民福利”越来越多,而非愈发“捉襟见肘”。否则,如果全盘推向市场撒手不管,任民众利益为“鱼肉”,既打击了人们对改革的期待,也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严禁转嫁个税不是给购房者的定心丸

龙敏飞 媒体人

3月5日,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住建部副部长齐骥接受和讯网和今视网联合采访时说,40个重点城市的住房信息基本上已经联网;将交易所得税转嫁给购房者的行为严重违规,国家将会出台保护购房者利益的措施。(3月12日今视网)

国五条“细则”一出,二手房交易需缴20%的个税便引发争议,坊间认为,这20%的个税,必然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转嫁给购房者,一旦如此,二手房交易市场必然冷淡,推高新房价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今,住建部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复,并表态称交易所得税如果转嫁给购房者,将视为严重违规,一定严处以儆效尤。这似乎可免除购房者的后顾之忧,让其吃了定心丸,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于20%个税而言,问题错在源头上,即“要不要征收个税”的问题,而如今修补的问题却是“转嫁不转嫁”的问

题。这样的应对方法,明显是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而是拿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来说事。任何问题的解决,如果没有抓住实质性的内容,只是玩些邪门歪道,终究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上流的堤垮了,你修补下流的堤,能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其实想想就知道了。

更何况,既然个税可以“转嫁”,那方式必然多种多样,最简单的形式,莫过于让购房者自己缴纳税款,或者抬高房价,前者是可以“严禁”的,但后者又如何严禁呢?买卖房是市场行为,那价格便由市场来定,既然如此,将个税隐于房价里,相关部门又如何“严禁”得了呢?卖房者肯定是不愿自己告诉住建局的,而购房者即便知道事情就是这样也是无法举证的,毕竟,卖房者有权决定自己房屋的价格,而购房者只有选择价格博弈、买或者不买的权利。

事实上,于买卖房而言,一切都只是数字游戏,你要卖房者缴纳个税,根

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卖房者不可能那么傻,自己承担这部分的费用,总会千方百计的转嫁给购房者。如果明目张胆的方式不让卖房者用,那他们转到“地下操作”就行了。更何况,于控制房价而言,加税从来都不是良策,多少次的加税增费,哪一次不是购房者买单?房价十年九控,房价依然居高不下,便是最为生动的诠释。

众所皆知,真要控制房价,不是加税调控,而是建立更多的保障房,缓解或者说是减少购房者的“刚性需求”,当需求降下来了,根据供需关系的杠杆原理,价格自然会降下去,而一味地增税加费,在刚性需求无法缓解的情况下,房价自然会越控越高,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故而,于售房个税而言,最大的争议是该不该收的问题,而不是转嫁不转嫁的问题,在各地细则还没有匹配之前,在二手房市场火爆、离婚率高升的现实窘境下,住建部的确需要对这样的规定进行重新审视,以便施行更为科学的决策。

移动老总备受“信骚扰”,怪谁?

乔志峰 时评人

浙江移动老总称一天也收10多条垃圾短信,很无奈。垃圾短信狂轰乱炸、个人信息被泄露,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总经理钟天华也不例外。“我最多时候,一天要收到十多条垃圾短信,真是很无奈。”在浙江代表团小组讨论上,钟天华这么说。(3月10日新民网)

移动老总也备受垃圾短信困扰,一副很无奈很委屈的模样儿。不过,在下并未因此生出同情,反倒有几分“幸灾乐祸”。一个网络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中国的手机用户都遭遇过垃圾短信的骚扰。并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若干年了,老百姓早就怨声载道了,媒体也屡屡曝光了,可情况却依然如故,且在一定范围内有愈演愈烈之势。难道移动等运营商不清楚吗?难道警方不知道吗?垃圾短信猖獗到这种地步,到底该怪谁?与之相关的企业和管理部门都应反思。

其实,从技术层面来看,遏制垃圾短信泛滥并不困难,通过资费清理、规范平台、畅通举报渠道、监控短信发送流量、内外共治等手段全面开展垃圾短信综合整治,完全可以让用户免受“信骚扰”。但

为何垃圾短信一直都难以根治呢?个中原由,除了某些部门的责任心不强,更是利益使然——由于短信服务收入是运营商收入的一部分,为了切身利益,运营商对内容、服务提供商管理并不严格,甚至还有纵容之嫌。移动老总吐槽“信骚扰”,更像是“撒娇”或者推卸责任。

媒体曾经报道过一个极端事例。北京通州的李老伯夜里频繁收到骚扰短信,一气之下,花3000多元购买了“呼死你”设备,见到广告短信号码,一律“呼死”。后来老先生又从网上下载了“呼死你”软件,继续对付这些骚扰电话和短信。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呼死”了近2000个电话号码,却没有一人报警。类似事件一是说明,当前垃圾短信已经猖獗到老百姓忍无可忍的地步;二是说明,只要动真格,垃圾短信并非不能治理;三是说明,相关部门对此打击不力,让一些老百姓对其失去了信心。垃圾短信已成社会公害,而运营商却仍然能拖就拖、不愿自断“财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彻底根治垃圾短信,还需立法部门尽快出台操作性强、可以有效打击垃圾短信的法律法规,靠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老百姓的权益。

空心村的明天 应与城镇化实现对接

堂吉伟德 职员

北京市农委副主任李成贵已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从研究到实践,他深知“三农”领域的重点难点所在。“一批批青壮年农民离开村庄,老年农民慢慢离开人世,空心村的明天在哪里?”(3月12日《人民日报》)

三农问题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农民,解决不好农民的就业与生计问题,空心村现象就难以避免。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还在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密切相关的情况下,推进新农村建设,对接城镇化发展,确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有效出路。不过,从已有的经验来看,要真正实现城镇化,就不能搞单纯的新镇建设,或者“逼农上楼”。

城镇的兴起必须依托于人气的聚集,若不能解决新农民的生存和就业问题,不能将流失的人数重新聚集起来,那么城镇化就会失去依托,建得再好的房子也只能成为空巢,城市也跟“鬼城”无异。一些地方之所以成为空城,是因为房地产没有必要的产业支撑,无以宜业自然就难以宜居,商品房除了“商品”的功能之外,缺少了最基本的居住价值。农民工之所以愿意向大城市汇集,原因就在于此。

空心村真正的问题在于,农民未能做到“洗脚上田”成为市民,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又无法依托片寸之地养家糊口或发家致富,“家庭联产承包”的模式难以对接市场的需要,结果便成了占而不耕,导致了大量的耕地荒废。从某种意义上讲,空心村背后是生存焦虑和权利困局,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养老成了农民的心头病,也成了城镇化过程必须解决的难点。

选择居住与生存方式是一种基本权利,空心村综合整治显然需要在政策的引导下,让人员自愿向城镇流动,农民自愿放弃职业身份而走向城市,以逐步改善乡村空心后责权利分离的状况,以解决分散承包与集中利用,抛荒浪费与建设急需之间的矛盾。

就业是民生之本,做农民也好,做市民也罢,解决乡村就业需要实体支撑,换言之,需要产业作为后盾,让农民能够在城市可以立足,能够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覆盖,才能谈及发展,解决其对土地的心理依赖和风险防范需要。因而在城镇化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切实考虑到农民的真正需要,以及农村所面临的真实情况,以产业立本,围绕项目造城,结合产业兴市,围绕产业搞建设,先做大产业再做大城市,才能让城镇化更加科学化,空心村的明天才能与城镇化实现高效对接。

文艺演出票价世界最贵并不意外

何勇 乡镇机关公务员

“中国现在票价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吴碧霞在北京代表团会场作报告时列举一组数字:我国平均演出票价450元,占低、中收入人群月平均收入的22.5%和13.6%,普通老百姓难以承受。她建议文艺演出票价应该更加合理,真正实现“文化惠民”。(3月11日《钱江晚报》)

按照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比较目前文艺演出门票价格,毫无疑问,我国文艺演出票价非常贵,在全世界确实最贵,远比美国的票价贵。更何况同一位明星在大陆和港台地区举办巡回演唱会,港台地区的票价只是大陆票价的一半,逼着一些内地观众选择用脚投票,跑去港台看演出。从这点上讲,我国文艺演出票价虚高、不合理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结合我国文艺演出的国情看,文艺演出票价世界最贵其实并不意外,

相反完全在情理之中,世界最贵的票价一点都不贵,因为我国文艺演出的成本更高,要远高于外国和港台地区。

众所周知,我国文艺演出行业存在一个早已是公开的潜规则,就是演出商为了疏通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必须留出一定量的座位票作为赠票,赠送给当地的公安、文化、消防等职能部门,有的文艺演出赠票多达三四成,而且大多数赠票属于前排座位的高价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演出商要想保证盈利,就必须将赠票成本全部转嫁给买票进场看文艺演出的消费者,那么途径只有一条,就是提高出售的演出门票价格。另一方面,一些企业把文艺演出的门票作为行贿礼物赠送给客户或地方官员,而票价太低很显然拿不出手,如此又助长了文艺演出票价价的虚高。从这个角度说,我国文艺演出门票价格世界最贵,实质上是腐败的结果,腐败抬高了票价,里面包括了一定的腐败成本,这个成本海外文艺演出是没有的。

再者,我国一直把文艺演出当成商业活动,并没有当成文化和民生行业,所以对于文艺演出行业没有给予优惠政策,而且还要缴纳税收。而在海外,即使文艺演出确实是商业演出,是为了盈利,但是仍然享受免税政策。

事实上正因为我国文艺演出票价世界最贵,所以近几年来,一些民间小文艺演出机构的文艺演出活动深受老百姓欢迎,包括小剧场、小场地的地方戏剧演出,像笔者所在镇前年来了一个本地地方剧庐剧小剧团露天演出,真是十里八村群众都来观看,每场观众多达千人。虽然他们在演出的很多方面无法跟大制作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在中低收入人群尤其是中老年观众中越来越赢得民意,越来越深受进不了大剧院看演出的消费者的喜爱和欢迎。因此,笔者以为,政府不如多扶持一下距离普通老百姓最近的小剧场、小剧团,用政策引导他们多走入普通老百姓当中,为老百姓送去文化大餐,他们才是文化惠民的真正基石。